

第一章

“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差距”

——西北开发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

这里是江河源头，这里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炎黄子孙由此起步走向世界。一路磕碰、撞击、接纳，一路播撒、交流、融合。这里曾筑就历史的辉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植被完好、山川秀美、繁荣富庶的沃野；中华民族最早面向世界的窗口……但自然地理条件的约束，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地矛盾的冲突，内乱战争的摧残，海洋文明的兴起，观念与政策的趋向以及历史的变迁，使这里由辉煌走向衰落，由开放陷入封闭。为了再现辉煌，超越历史，一批批仁人志士殚精竭虑，前仆后继，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探索和实践尝试。已取得的成绩使我们振奋，日益扩大的差距又令我们焦虑。当我们今天在新的环境下、新的起点上，以新思路、新模式、新机制、新方法开发西北，再造西北时，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过去。因为昨天是今天思考的基础、明天前进的镜子。

第一节 历史上西北地区的繁荣与衰落

一、西北地区的繁荣

在截止唐中期的中国古代社会前期，西北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中华文明的兴起和拓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 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据传说，我们的祖先华夏族，最早就生活在今甘肃、陕西两省交界的黄土高原附近。早在旧石器时代，西北地区就遍布着华夏民族的足迹。如早于北京猿人的陕西蓝田猿人距今约 65 万年至 80 万年；甘肃庆阳地区发现的多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距今约一二十万年至三万年之间，都是中国最早的人类产生与活动的历史见证。到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几乎遍及西北各地。据历史学家考证，黄河流域在六七千年前就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西安半坡遗址所属的仰韶文化，是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在甘肃、青海等地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陕西关中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都向人们昭示着华夏民族祖先在此生息的悠久历史。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七千年左右，遗址出土的彩绘符号被认为是我国文字的起源；陕西半坡遗址中发现了成堆的粟，说明农耕已在这里开始。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中有龙形彩绘，说明龙已开始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龙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别称，就源于此，西北地区是“龙的故乡”。延安黄帝陵、宝鸡炎帝陵向人们展示了华夏民族对自己伟大始祖的怀念。在这里，姜子牙辅周灭纣，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武帝东进西出、南征北战、屯田拓疆；在这里，周、秦、汉、唐、西夏等十多个王朝建都立业；在这

里，一条丝绸之路绵延万里、横跨亚欧，向世界播撒中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这里，造纸、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等发明影响了整个世界。

2. 森林茂盛、绿盖原野、植被良好

据考证，古代历史上西北大部分地区是森林和森林草原地带，不仅古木参天、绿盖原野、植被良好，而且水利资源相当丰富、河水流量大、舟楫便利。据史料记载，西周时期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达 50% 以上，其余为一望无际的草原。秦汉时期，“陕西天水山多林木，民以板屋为室”，秦国在秦孝公之前，基本上是一个依靠森林草地、以养殖畜牧为主的国家。北魏初期，河套地区居住有大量敕勒人。“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乐府诗集·敕勒歌》），反映了当时阴山南部一带水草丰盛，畜牧业发达的美景。另据文献记载，“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力多”则是古时描绘陕西一带的自然风光的。甘肃目前自然条件最为严峻的会宁、定西一带，历史上也是粮丰林茂、草盛畜旺的好地方。据《会宁县志》记载：“唐代贞观八年（634 年），因盛产粮粟，仓储殷实，曾诏改会州为粟州。”长期以来，会宁一直是陇右粮食生产基地。境内尚存的白草塬、草滩、放马场、鹿儿塬、老虎沟、野鸡塬之类的地名，以及至今南部群众还不时从河水冲刷的悬崖上挖出尚未完全腐朽的松树，证明会宁在历史上确实曾是树木葱茏，粮丰物阜，牛羊成群。另据《定西县志》记载：“清代以前，（定西）森林极盛，乾隆以后，东南两区砍伐殆尽。西北地区犹多大树，地方建筑实利赖焉。”又据甘肃定西史载：一次，一朝廷大臣携贡品上路，不走旱路走水路，当地官员赶忙上山，砍下大树，造成了 20 艘大船，浩浩荡荡南下。

3. 经济繁荣，百姓富庶，社会稳定

西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的两次大分工，逐

渐形成了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农牧兼营互补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屯田制等多种较为灵活的生产管理形式，有力地促进了西北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的关中地区有“粮仓”、“陆海”和“九州膏腴之地”的美称，成为全国最富庶的经济地区。“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史记·货殖列传》）随着经济发展，在黄河流域出现了许多发挥经济中心作用的中心城镇，位于关中盆地中心的咸阳、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经济发展、商业畅盛、交通便利。“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实，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关陇地区之富庶为国内其他各地所不及，唐朝前期，“自安远门（长安西城门之一）西尽唐域万二千里，间阎相重，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第 216 卷）这里的陇右实指西域内属诸国，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北广大地区。这已充分说明西北当时的繁荣富庶。另据史料的反映，当时西北地区的民族冲突相对缓和，社会比较稳定，这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

4. 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基地，古代对外开放的典范

自先秦以来，西北就有与西域、中亚、西亚等地联系的渠道。汉武帝雄才大略，在东征西讨、拓疆扩土，奠定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基本版图后，即派使者张骞出使西域，最先打通了绵延万里、横跨亚欧的黄金通道——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为西北和中原内地与西方各民族国家的交往打开了一个窗口，由此全面带动了西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当国内其它地区仅有地方性和国内市场时，西北率先打开了国际市场，西北经济的优势和繁荣可见一斑。沿着这条道路，当时许多国家的商人、学者、使者，云集汉唐长安，中国的天文、数学、医学、农耕、制陶及四大发明传向中亚地区，影响了整个世界，中外商业、科技、文化、思想、宗教等的交流、融合，达到空前的程度；沿着这条路，一代

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金戈铁马横扫欧亚大陆，将中华版图扩大到黑海、高加索、叙利亚、匈牙利；借着这条路，马可·波罗认识和传播了东方中国的信息。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象征，是西北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而且至明代之前的千余年间，丝绸之路一直是中国和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主要通道，西北地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基地。

二、西北地区的衰落

从夏、商、周到唐代初期，历经三千多年，黄河流域一直是大多数朝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处于黄河流域源头的西北地区也创造了经济繁荣、百姓富庶、社会文明的辉煌，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唐中期以后，西北渐趋衰落，国家经济重心南倾，一直到南宋王朝，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最终南移，确立了南方经济的优势地位。元、明、清时期，南方的优势有了进一步发展，西北发展相对更趋落后。

1. 经济重心的南倾

唐朝中期当统治者仍在享受“贞观之治”的福祉，沉醉于粮丰物阜、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时，危机和灾难嘎然而至。公元756年（天宝1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动摇了唐王朝的根基，同时严重侵蚀和打击了黄河流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文明。“安史之乱”后，北方长期处于“藩镇”割据的混战状态，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下降。

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开始超过北方，首先创造辉煌的西北已走向衰落。这一时期，南方的开发，经济地位的提高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新置州县和人口大幅增长。中唐以后，江南、剑南、岭南三道新增州 42 个、县 185 个。全国 4 万户以上的府州共 15 个，江南 9 个，剑南、岭南各 1 个。400 户以上的县共 164 个，江南、剑南、岭南达 111 个（《元和郡县志》）。州县及其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进步。

农业、手工业生产的长足发展。随着人口重心的南移，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也南移。农业方面集中体现在插秧、稻麦复种技术的推广和水利工程的发展，水田面积的扩大及“山田”的开发。手工业方面，有色金属冶炼、金属铸造、造船业、纺织业、制革业都有显著进步，达到空前规模。

市场扩大，商业繁荣，货币流通量增长，城市增加，海外贸易发达。黄河流域除几个重要城市有所发展外，多数城市因战火摧残趋于衰落，以后各朝代再也没有在黄河流域建立起都城和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区，而南方城市却日益增加，苏州、杭州、扬州等皆兴于斯。这些城市不仅是当时著名的商贸中心和物资集散地，也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已作为交易货币进入流通，反映了社会经济生产的进步。

国家税赋的主要来源发生变化。据《全唐文》第 555 卷的记载，“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反映了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

2. 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

唐朝中后期，国家经济重心出现南倾的趋势，但长江流域尚未完全取代黄河流域原有的地位，政治、文化中心仍在北方。黄河流域原处的中国经济重心的最终移位可追溯至南宋王朝。随着以农业为主要特征的经济重心的南移，社会政治文化中心移至江南。

北宋时期实行的奖励垦殖，减免劳役赋税的政策，极大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水田和畜产量进一步提高。南方水稻产量超

过北方旱作的麦、粟，使南方成为重要经济区。长江流域以南地区耕地面积扩大到全国的 36%，水资源 80% 以上分布于长江以南。南宋时期，棉纺织业等手工业和对外贸易都有进一步发展，南方出现了许多商业城市。泉州、广州、杭州等已成为重要国际商业港口。商品货币关系也日趋活跃，“交子”、“会子”等纸币开始广泛流通。

南方经济的迅速上升，进一步打破了南北经济发展的均势，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城市、商品货币量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北方，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北衰南盛的局面最终以完全确立。西部尤其是西北部的发展失去了政治的庇护和支持，缺乏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滋养；沦入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农耕自然经济。

三、西北经济衰落的原因

1. 自然条件、政治内乱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连绵不断的战争使生灵涂炭，经济倒退。北魏西征夏统万城时，就在阴山一带伐木，用于战争，许多树木葱茏的山岭顷刻变为荒野。“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长期藩镇混战，生态条件急剧恶化殆尽，民不聊生。宋时的契丹、西夏、女真等边疆部族不断侵扰黄河流域，战争中，落后部族掠夺性入侵，所到之处荒山秃岭、人烟断绝、经济凋敝，使过去的许多垦区荒废、沙化，水源干涸，逐渐荒芜而被遗弃。

长期大面积的超强度、掠夺性垦殖和广种薄收的粗放型农耕经营方式也造成环境恶化，灾害频繁。秦、西汉时期，大力推行“移民戍边”和“屯垦”政策。开始大规模纵火烧山、毁林开荒，除草为田，使黄土高原和广大山区的林草资源及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过度樵采、乱垦滥挖、超载放牧、肆意践踏，使地表植被遭到严重侵蚀，河川水文状况恶化，水土流失严重，风

沙泛起，旱、涝、火、泥石流、风沙等灾害愈演愈烈。以旱灾为主的自然灾害从此成为西北地区生态状况恶化的集中表现。严重的旱灾不仅使人们吃光树皮草根，甚至“人相食”，还经常引起社会动乱和王朝更迭。与旱灾相对应的是水灾。据统计，黄河在秦以前仅发生过三次改道。可从西汉初年至王莽篡位的 180 年间，黄河十余次决口，五次大改道。宋代平均每 30.2 年发生一次大水灾，元代 4.8 年一次，从公元前 602 年到 1949 年的 2500 多年，黄河决口泛滥有 543 年，决口 1950 次，改道 26 次。植被破坏的另一直接后果是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泥石流，往往造成河道的淤积，河床提高，在下游形成“悬河”或“断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遭遇生存的威胁。汉代以前，西北本是林草繁茂、城镇密布的沃野大地，但林草破坏导致的土地沙化使古时的繁华不再存在。丝绸之路上被称为“西域三十六国”的若羌、鄯善、精绝、于阗等古国以及三封、临戎等古城，曾经是“使者相望于道”、“商贩往来不绝”的商埠要道，如今“子然而存”的只是废墟残丘，仿佛在向后人泣诉自己遭遇的不幸。据沙漠学和考古学专家推算，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向南扩张了 100 多公里……

广种薄收的粗放型农耕方式使西北地区的农业陷入恶性循环的深渊。黄土高原大面积林草的破坏，使农业失去了生态屏障，导致了广种薄收、掠夺式利用土地及粗放耕作方式，每年既有大量耕地因退化被撂荒，又重新垦殖大面积的草原来补充耕地，从而使农业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结果是粮食产量的锐减和生态的进一步恶化。维系农业社会生存延续的主要物质基础遭受严重侵蚀，经济的辐射和影响力大打折扣。

统治者大兴土木，过度砍伐是西北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秦汉时期，兴建皇室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幢幢豪宅的竣工往往是以一片片树林的被砍伐作为代价。秦时大规模

修建长城，征用全国几乎 $1/3$ 的劳动力，沿途森林备受劫难，烧砖取暖等所耗木材难以计数。

人口的急剧膨胀，人地矛盾的突出，使本来较好的生态环境又雪上加霜。唐朝初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相对社会的稳定，人口急剧增长，到公元 755 年，人口已达 5 300 万，比隋末增加了一倍，仅京师长安，人口就超过百万。至明以前，中国人口长期稳定在 4 000~6 000 万，清末剧增至 4 亿人。大量人口维系生存的需要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仅烧柴做饭一项每年就要消耗大量林木。

⑥ 思想观念的滞后也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所限，当时的人们尚缺乏环境保护的意识，更谈不上可持续性发展的观念，导致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时有发生。据史料记载，明代为了防边，每年秋后都要将长城以北数百里纵深的草地放火烧光。

总之，由上述因素导致的地理、自然条件的严酷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导致西北经济发展衰落的根本因素。

2. 东南部的较快发展，也是西北发展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

东南部气候湿润，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农业基础条件好，使其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商品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农业、手工业、商贸，甚至政治、文化逐渐赶上和超过西北。南宋政权建立后，曾拥有过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以后造船技术和沿海贸易有较大发展，西部各政权与宋王朝时战时和，黄金通道丝绸之路处于长期关闭状态，西北与外界的联系明显减少，封闭式经济雏形已具。明代以后交通主体开始由陆地转为水运，郑和七下西洋，标志着东南部地区与外界联系的加强。东南部经济在中央政权的支持、影响下，迅速发展，日益强盛，使西北地区与东南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

此外，统治阶级实施的政策、历史的变迁、资本主义的发

展、海洋文明的兴起等也是造成西北衰落的重要原因。

第二节 近代以来对西北地区的开发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基于对西北地区战略地位、资源禀赋、移民屯垦重要性的认识及战争威胁、自身落后、民族和睦、社会稳定的觉醒。近代以来，“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呼声不绝于耳，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左宗棠、梁启超、孙中山；从洋务派到国民党政府，再到新中国建立后的探索与实践，西北开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艰难的探索和尝试过程。

一、清朝洋务派与西北开发

洋务派是清朝时期一批掌握军事力量和政府实权的开明官僚构成的思想派别和集团力量。他们认识到外国先进科技和发达生产力的强大威力，主张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管理，引进和培养人才的洋务运动来致富图强、挽救垂危的封建王朝。洋务派喊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力求通过办洋务达到“息内患”，“御外侮”以及致富图强的目的。他们开展了一场涉及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的广泛的学习西方运动，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和民用工业，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近代工业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诞生也由此发端。

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的重点区域分布虽是东南沿海（江）各大城市，但西北地区也有所分布。如同光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曾提出过一系列“开发西北”的主张。认为只有开发西北，才能使列强无隙可乘。在移民戍边、屯田种粮、植棉劝桑的同时，他在西北首创近代工业，开发西北。1869年，他在西安设

立西安机器局，标志着西北近代工业的创始。1872年，西安机器局迁至兰州，改为兰州制造局，1919年更名为甘肃制造局。1894年，陕西巡抚鹿传霖在西安设立陕西机器制造局，次年更名为陕西机器局，主要试制军火，初具规模。1897年新疆巡抚饶应祺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成立新疆机器局。以上军工企业虽数量少，规模小，但作为西北近代工业的起点和先导，对西部民用工业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西北的民用工业是19世纪70年代末以官办方式在纺织等行业中率先发展起来的。1878年，左宗棠创建的兰州机器织呢局，耗资30万两白银，进口德国毛纺织机器60余台，是西北毛纺织工业开发的先河，也是中国近代毛纺织工业的鼻祖。1896年，陕西著名学者刘古愚开设的人力机器轧花厂，开了西部近代机器轧花的先河。1905年，陕西筹资8.1万两白银，购买、聘请日本设备和技师创办的延长油矿，是“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填补了西北工业的一大空白，也是全国石油工业开发的先驱，由此打消了中国大陆不产石油的偏见。1910年甘肃劝业道彭英甲利用比利时设备创办甘肃炼铜厂（即窑街官铜厂），是西部开采最早、规模较大的第一个近代化的冶炼厂。1910年，新疆商人玉赛音创办“福盛行皮革厂”，雇工百余人，年产革万余张，是新疆地区近代民用工业的先驱。总之，在洋务运动中，以官办、官商合办或民办形式创办的近代工矿业在西北有一定发展，尽管水平有限，但毕竟为西北的开发作了一定的尝试。

二、孙中山的西北经济开发战略构想与国民党政府的西北开发实践

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同时，也非常关注西北落后地区经济的开发，在其《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部分中，孙中山先生对

西北经济的开发提出了许多宏伟的战略构想，充分体现了一代历史伟人的远见卓识。尽管他的构想和规划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有些论点也有失偏颇，但总体上看，其构想包含有大量积极性、合理性、科学性的一面，对我们当前实施西北开发大战略有重要启示。孙先生的战略构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开发利用西北地区的农牧业资源，把广大西北地区建设成为“最大食物之生产地方”。^①

二是发展西北地区的羊毛、毛纺工业，“吾意当以科学方法养羊、剪毛，以改良其制品，增加其数量。于中国西部全部设立工场以制造一切羊毛货物，原料及工价甚廉，市场复大至无限”。^②

三是根据西北地区丰富的矿藏资源，采取政府承办与私人经营并举，以政府经营为主的方针，在西北大力发展采矿、石油勘探等原材料工业，既使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也为将来汽车、钢铁、机械制造等工业的发展铺垫基础。

四是主张全力发展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他指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他在其《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的“第一计划”第二部分中，全面规划了“西北铁路系统”，这一系统的核心是由北方大港（渤海湾所建之港）始，经滦河谷地，至多伦诺尔，最后进展于西北。并认为，这种铁路系统“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盖将为欧亚铁路系统之主干，而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因以联结。”

五是主张实施移民实边垦荒政策。认为发展以铁路为重点的

①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361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391 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383 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261~262 页

交通运输业仅是开发西北的手段和条件，而移民垦边则是“最有利之事业”，^①具有更为重要之战略意义，即可以发挥缓解内地人口就业压力、补充西北地区所需劳动力、以及直接开发西北资源的重要作用。

六是通过设立兴农、殖边银行，为西北开发提供金融支持。他认为，“西北之荒芜，一如其故，此无他，无特别金融机关以为之通融资本故耳”，^②“创设兴农、农业、殖边等银行，实数方今扼要之图”。^③他还主张对有关开发西北的实业公司和科研团体通过拨付专款等形式给予财政支持。

七是认为西北经济的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政府也为西北开发做过一些工作，如 1928 年确定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为当前要政，选派西北科学考察团进行实地考察。1930 年 7 月曾制定《开发西北计划》，涉及开发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至抗战前，国民党历次中央全会通过的有关西北开发的决议案达二十余个，其中主要的有《开发西北案》、《限期碗成西疆铁路案》、《拟请提前完成陇海线西兰段铁路以利巩固国防案》等。民间也成立了“西北问题研究会”与“开发西北协会”，创办了《开发西北》与《西北问题季刊》等学术刊物，支持西北开发。实践中影响较大的是陇海铁路于 1931 年通至潼关，1934 年通至西安。以西安为中心通往西北各地的公路干线也先后通车。随着东中部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军阀割据局面的基本结束，一些东部实业家也开始向西北投资。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将沿海的一些工商企业迁往西北地

^①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264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265 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267 页

区，一度促使当地的工商业有较快发展。同时利用旧轨建设了宝鸡至天水铁路，修通了长达 3400 千米的兰新公路线，并与苏联铁路线连接；改善和修筑了大量公路，初步建立了西北的交通网络。抗战结束后，由于西部大量工业又迁回东部，特别是随着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西北同全国经济一样遭受沉重打击，濒于崩溃的边缘。总之，国民党政府为西北开发曾进行过一些规划和舆论准备，并在交通运输业、纺织工业、日用品化学工业、军事工业等领域做过一些实践尝试，对西北开发有一定推动，但总体看，是考察、规划多，具体对策和实际行动少；呼声、调门高，效率低。

第三节 新中国对西北的开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西北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建国 50 余年，对西北的开发可划分为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从 1949 年到 70 年代末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时期对西北的开发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大背景下，强调综合平衡，采取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从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则实施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非均衡梯度推移发展战略。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西北开发

1. 国民经济恢复及“一五”、“二五”时期对西北的开发（1950 年至 60 年代初期）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就提出要改变工业生产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现象，将建设的重点区域逐渐向内地转移，当时在继续建设东北、华东、华北的老工业基地的同时，将一部分工厂迁移到接近原料、市场的地区，另外从恢复国民经济和加强国防安全两方面考虑，也从沿海搬迁了少数易于搬动的工厂到内地。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建设投资的重点主要用于恢复东北地区的重工业、治理黄淮、恢复发展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和修建西南、西北铁路与公路等方面。在西北，建国伊始，即着手整治宝天（宝鸡至天水）铁路，1952 年天兰铁路建成通车。随后即动工修建宝成线、兰新线、兰青线、包兰线。公路方面，修建新兰线，西宁黄河沿线等，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明显改善了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

“一五”时期，国家基于“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发展”的指导思想，在产业布局上，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重点在西部建设一批原材料和重工业基地；在地区布局上，实行均衡发展战略，提出新建 8 个重工业区，其中包括以电器机械制造为中心的西安、以能源原材料为中心的兰州；在建设项目和投资分配上也大力向西部倾斜。“一五”时期，对西部的倾斜和投资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尤其将陕西、甘肃作为中心建设区域。这一时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约 588 亿元，西部地区占 18.52%，其中西北和西南各占 11.53% 和 6.99%，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建设工程，西部省份占 1/5，其中陕西有 24 项，占 15.54%，居全国首位，占国家投资总额的 18.25%；甘肃安排了 16 项，占全国重点项目的 10.3%，国家投资 23.27 亿元。国内建设的 1 000 万元以上的限额项目，西部占了 1/5。项目的设置主要集中于军工、煤炭、能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和机械制造上。“一五”期间，整治和修建了天兰、宝成、兰新铁路和青藏公路；发现了新疆克拉玛依、玉门鸭儿峡等油田，建成了兰州炼油厂；新建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西安钢厂、兰化、西安飞机制造公司、西安黄河机械厂以及国防工业的 805 厂、504 厂、404 厂等大型骨干企业；建设了西安、兰州西固、乌鲁木齐等热电厂和陕西玉门石凹煤矿等能源企业。通过大规模的建设，逐步在西北形成了以西安、兰州等城市为依托的新工业基

地。

“二五”时期基本承继了“一五”的建设思路，虽然受到当时大炼钢铁和工业生产遍地开花的不良影响，但还是重视了对西部地区的投资，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 20% 以上，并在西部建设成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钢铁企业，西北的各省会城市，都新建了一批大中型企业。此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虽然强调要兼顾内地和沿海的发展，其他省份的建设规模压缩较大，但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却上升到 24%，西北经济也有相对较快的发展，这时投资重点是甘肃金川有色金属新基地建设；新疆的石油和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兰州、西宁、乌鲁木齐、银川等地的机械工业基地建设；甘肃、宁夏、青海的煤炭基地建设，以及 404 厂、504 厂等军工企业的建设。

通过上述时期的建设，初步建立起了西北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以铁路、公路为重点的交通运输网，为西北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

2. “三线建设”及“五五”计划时期西北的发展（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期）

这一时期针对我国周边环境的变化和准备打仗的形势判断，中央在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上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即把全国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在各省区内也相应地划分出“小三线”，经济建设和工业布局的重点是“三线”地区，特别是西南的四川、贵州、西北的陕西、甘肃、以及鄂南、豫西等地，项目建设以进山、分散、钻洞为特色。“三线”建设始于 1964 年，建设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 1964 年至 1968 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以西南为重点进行三线建设；1969 年至 1973 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三线建设的重点转向“三西”（豫西、湘西、鄂西）地区。三线建设时期，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战备的要求，

将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山东、闽赣、新疆等 10 个协作区；要求在每个协作区内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相对独立、大力协同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计划有步骤地重点发展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力和化学等工业部门。西北地区虽不属三线建设的重点，但作为内陆地区和三线地区之一，这一时期，也通过沿海地区老企业向三线地区搬迁及投资新建等形式，建成了一批重要项目，如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刘家峡水电厂；形成了若干新工业中心，如以机床、轴承制造为特色的汉中工业区，以机床工具、农机配件制造为特色的天水工业区，以仪表、机床制造为特色的银川工业区和以机床、拖拉机、内燃机制造为特色的西宁工业区等；陕西、甘肃省建立起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基础，成为工业门类齐全、机械装备程度较高的省份。“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国防科技工业、燃料动力工业、机械工业等夯实了西北经济发展的基础，对全区经济的开发起过重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四五”计划后期至“五五”计划时期，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国家经济建设和工业布局的重点也由内地向沿海发达地区逐步转移。新建项目和重点项目主要配置在东部海岸带、长江沿岸及内地的江汉平原、辽宁中部等工业城镇集聚地区，如 1978 年底前引进的 47 个主要成套项目中，有 24 个摆在沿海地带，中部和西部分别有 12 个和 11 个，在 1973 到 1980 年期间建成投产的 10 个大型炼油厂和 4 个扩建的炼油厂中，长江沿岸新配置了 6 个（不含上海），沿海地区在全国基建投资中所占比重增至 42.09%，工业增长速度也开始超过内地。这一时期，对西部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四川南部地区，对西北的投资比重开始降低。